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 出场逻辑、理论内核与时代观照

杨爱卿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2200)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创榛辟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思想。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从理论源泉、精神血脉、历史演进三重逻辑出场,其理论内核包含人民主体论、综合认识论、内生动力论、过程方法论四重维度。新时代下,从返本开新的角度深刻把握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时代观照,有利于从人民至上、系统观念、分配正义、道路超越的向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命题。

关键词:毛泽东;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5)02-0019-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5.02.003

Mao Zedong Thought on Common Prosperity: Emergence Logic, Theoretical Core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YANG Aiqing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CPC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Wuhan 432200,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spent his entire life forging ahead on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ming a unique thought on common prosperity. Mao Zedong Thought on Common Prosperity emerged from the triple logic of theoretical source, spiritual bloodline,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Its theoretical core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people-centered theory, comprehensive epistemology, endogenous motivation theory, and process methodology. In the new era, a profound grasp of Mao Zedong Thought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ing up new” is conducive to answering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wh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hat kind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chieve, and how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ople-first, systematic concept,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ath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Mao Zedong; 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1][22]}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创榛辟莽,终究淬砺而成其

收稿日期:2023-11-14

作者简介:杨爱卿(2000-),男,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思想。

从国内学界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其理论框架出发进行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基础进行研究。有学者通过对 1953 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认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2]。二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特点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锚定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近似绝对平等的价值取向、注重调整生产关系的分配手段构成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特点^[3]。三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理路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十分注重全方位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其偏差和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意义^[4]。尽管国内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前提研究欠深、内容研究欠全、意义研究欠新等不足。因此,进一步探赜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出场逻辑、理论内核与时代观照,对阐明如何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出场逻辑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14}运用“从后思索”法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进行包含理论源泉、精神血脉、历史演进等在内的多向度出场逻辑分析,是科学理解其理论内核及其时代观照“何以可行”的必要条件。

(一)理论源泉: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守正创新

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没有直接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蓝图的擘画中,已经内蕴着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制度表征及价值旨归。

第一,先进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物质前提。区别于狭窄虚幻的“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从

唯物史观视阈描述了共同富裕,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787}。这一“物质第一性”的立足基点,开辟了共同富裕由空想走向科学的理性大道。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力在共同富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深化了对实现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认识。在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著,李达、雷仲坚译,中译本第三版)后,毛泽东逐步将“工业化”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并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制度表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性规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超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积累的社会财富只会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痛苦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毛泽东为防止新的“贵族阶层”出现,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生产关系问题上,进一步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虽在实际中陷入了平均主义的窠臼,但为后期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第三,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价值旨归。马克思、恩格斯从人是实现自身幸福、富裕的主体力量角度阐释了“三形态说”,认为在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后,“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5]787}。从这一角度讲,毛泽东高度防范劳动异化,认为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由调配劳动力,并建立与之配套的工资福利制度,从而为消灭旧式分工和劳动剥削创造条件。因此,毛泽东在制度实践上极其重视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与塑造,故而在科教文卫事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共同富裕的“自由王国”被毛泽东置于群众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事业中予以把握。

(二)精神血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理想的动态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理想彰显着天下大同的千年追求、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义利

相兼的价值取向,其在人文积淀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传统天下观、民本观、道德观。

第一,传统天下观下的“大同理想”。“大同理想”体现了古代先贤对“志德之世”的向往和追求,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精神内核,直到近代在《天朝田亩制度》《大同书》和孙中山相关著作中还均有生动描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谙熟者,青年毛泽东常援引“大同”比喻共同富裕,并于岳麓山脚下进行了“新村主义”的实验与工读互助运动的尝试,惜均以失败告终。这一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意识到,建立在旧制度基础上的改良,只会沦为浪漫的“空中楼阁”。正是在对“大同理想”的批判反思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受实践中,毛泽东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6]¹⁴⁷¹。

第二,传统民本观下的“民贵君轻”。传统民本观滥觞于上古时期、发轫于春秋战国、发展于汉至清初,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主题的理性思考。但由于其扎根于旧的等级结构与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7]的文化复合体。不同于传统民本观的统治逻辑,毛泽东在主张以共同富裕消除社会上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争斗欺诈等现象的过程中,批判继承了重民、爱民、利民等政治精髓,并针对其等级性、工具性、狭隘性等历史局限,将传统民本观发展为以政治平等为昭彰的人民民主观。

第三,传统道德观下的“义利相兼”。“义利相兼”是中国传统哲学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本质是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探讨。对此,毛泽东批判继承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传统义利观,将物质与精神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系统推进。毛泽东认为“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8],而两者结合的根本途径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毛泽东在制度设计方面极力避免任何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政

策,高度重视物质供应与精神享受的平衡。

(三)历史演进:对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经验的总结升华

面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模糊认识的情况,毛泽东注重从应然的哲学层面探讨其方法论原则,一部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道路探索史也是一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升华史。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推进共同富裕,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无现成答案可寻。对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首次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诠释。正是秉持着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共同富裕之“的”的态度,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9]¹¹⁶

第二,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六大虽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但是“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10]⁹⁵⁸。对此,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首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典型论述。正是出于对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视,毛泽东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力量之源,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¹⁰³¹。

第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立足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经典文献中系统总结了苏联共同富裕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经济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两方面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了工业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与服务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二、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内核

列宁指出：“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11]毛泽东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应然”的正义感和“实然”的历史感，其共同富裕思想从人民主体论、综合认识论、内生动力论、过程方法论四重维度对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的理论内核作出了深刻阐释。

(一)人民主体论维度：共同富裕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全民共富

全民共富中的工农联盟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语境中经历了理论和历史地平线的转换，是毛泽东结合我国国情从生产关系视阈对共同富裕作出的本质性规定。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虽认识到工人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2]769，但他们也从农民“马铃薯堆积式”的生存状态出发，指明了其落后保守的私有制观念和冷漠消极的革命态度。列宁试图以一系列关于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新经济政策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在他逝世后，他的相关思想并未在斯大林时期得以实施和完善。对此，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基本国情出发，明确回答了工农联盟是全民共富的人民主体，进而逐渐探索出一条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同富裕道路。

工农联盟是毛泽东为巩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方针。其中，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就必然会发展起来。”^[13]在毛泽东看来，农民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不同阶层，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革命态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以迅速改变贫下中农的生活面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不仅对农民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也对如何更好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进行了全新审视。毛泽东

认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6]1479

(二)综合认识论维度：共同富裕是协调物质、精神的全面富裕

全面富裕包含物质与精神两重向度，是毛泽东从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两方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一方面，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基础积淀。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起着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文明转轨至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作用。然而，工业化的开启不是“飞来之石”，而是依托于中国共产党先谋求民族独立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选择。因此，用革命的手段造就工业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迈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大力推行土地改革，认为“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6]1254。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社会现实，毛泽东除继续加速推进新式工业化进程外，还高度重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防范化解资本逻辑运行下的诸多“二律背反”现象，实现了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价值彰显。作为共同富裕的首倡者，毛泽东极其重视从精神文明高度拓宽共同富裕的概念外延。毛泽东认为：“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14]而要促使公民实现自觉的精神交往、精神创造、精神享受，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此，毛泽东确立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旨在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心理认知层面最大限度扫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便在全社会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建构人民群众集体精神记忆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导并推进的一系列政策，有效促进了精神文化产品的

公平分配,营造了良好的共同富裕文化生态。

(三)内生动力论维度:共同富裕是引导集体互助的共建共富

共建共富着眼于政治平等下的集体互助,总体上以“先均后富,均中求富”为基本特征,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以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先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路径进行了试验探索,但归根结底是少数自觉的精英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转型的思考变革,其并未提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现代化国家转型由此陷入困境和误区。

青年毛泽东承负了未竟的共和遗志,毕生锚定“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目标,认为“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5]137}而任何集体互助的民众联合都必须具有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富机制、政策支持和方向保障。因此,在通往马克思“社会共和国”理想的征途上,毛泽东首先在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层面突出“社会主义合作化”,强调利益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乡村建设上,毛泽东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民的互助合作经验,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极大提升了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在城镇建设上,毛泽东以国营经济的建立为基础,开始有计划地集中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资源,并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一批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对毛泽东而言,要确保人民大众集体互助精神的长期性,就必须在对人民大众的有效组织中推行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原则,即以共建共富为目的,建构社会主义集体内部的伦理关系体系。一方面,在集体内部关系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人民的积极性统一到国家共同富裕建设事业上来,并同心同德地逐步解决人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共同体之外的小资意识,毛泽东从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提出人

民民主专政理论,避免在共建中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冲击和摧毁共富中的集体互助的共和美德。

(四)过程方法论维度:共同富裕是强调以苏为鉴的逐步共富

逐步共富是毛泽东在客观分析苏联模式基础上而采取的实践方式,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世界历史规律,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价值目标。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毛泽东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5]325}。然而如何对待“俄式革命”和“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回答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经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阶段,从而实现了由“走俄国人的路”到“向苏联学习”的顺势转变。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等方针,无疑为毛泽东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然而,毛泽东逐渐察觉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不利于全民共富的弊端,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思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从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方式推进逐步共富。毛泽东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缓,波浪式地向前发展。”^{[9]326}一方面,毛泽东开始结合中国人口、国土面积及自然资源三项指标,加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国民经济基础和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出发,开始根据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作任务规划。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国民经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蓝图,并以“二五”到“四五”的发展规划为抓手,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

三、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时代观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

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11}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从正面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求共同富裕的浓郁情愫与集体心态,其逻辑严密的理论内核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的“术语革命”,对于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极强的时代观照。

(一)以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体推进共同富裕

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从巩固工农联盟、坚持工农并举、兼顾城乡统筹三个方面对推进全民共富进行了艰辛探索。经过数十年的接续奋斗,我国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但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6]146}。因此,科学把握城乡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基本规律,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建设中尤为必要。

具体来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包括“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17]四个方面。发展“工农互促”,应吸收借鉴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系列思想,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实现工业与农业在生产要素上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国家要立足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工农全域立体化规划,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保障的财政体制机制,在人民主体性的实践层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行业基础向多元跃迁。促进“城乡互补”,应避免走以低价统购、低价统销等方式获取价格“剪刀差”的苏联老路,而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城乡一二三上下游互补产业,在城乡资源平等交换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与城乡对立,为共同富裕中的共享机制奠定基础条件。坚持“协调发展”,应立足“老三线”建设形成的区位优势与基础条件,着力破除户籍、土地、资本等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构建以权利平等、机会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共同繁荣”,应以“三反五反”精神为着力

点,从价值取向上防范新的“贵族阶层”。要根据城乡居民需求结构变化,最大限度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机制,拓展传统工农行业功能,延伸工农产业链与价值链。总之,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必须从毛泽东的工农联盟角度出发,以乡村振兴的全新实践推进全民共富的理论创新。

(二)以促进物质、精神良性互动为用推进共同富裕

在以工业化通向现代化的基础上,毛泽东还重视发挥公共精神对建构共同富裕社会的能动性作用,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9]124}。也正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政治秩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才被同步建构,为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与物质脱贫的成就相比,部分民众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新的精神异化问题。对此,习近平将“精神”明确纳入共同富裕范畴,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6]142}。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出发,准确把握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讲,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公平分配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表征,包括精神产品的交互共享、价值凝聚等。但从实际讲,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耦合互动^[18],因此不能从线性决定论狭隘理解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故而,要将“物质基础”与“智力支持”统一起来进行价值评判,深刻理解两者的综合平衡关系,达到物质与精神良性互动的共同富裕境界。

(三)以加强公平、公正、公益为魂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侧重于对结果的描述,而分配正

义则更体现对致富过程和规则的重视。当前,社会分配正义中的“资源共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劳动贡献原则、社会必需原则”^[19]鲜明体现了“公平公正公益”精神。

资源共有原则表示生产资料的最终归属关系,主要体现为坚持“全民所有十个人持有”的社会共有模式。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发展了,也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20]。因此,在资源共有的前提下,必须厘清资源主体及其他成员间的权、责、利关系,建立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置结合的现代产权制度。机会平等原则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旨在通过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措施,为社会成员平等占有资源创造公平普惠的权利、机会和规则环境。现代经济的运行实践充分表明,盲目追求分配结果的完全平等,不仅难以保持经济的持久效率,而且在权力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本身将作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载体。劳动贡献原则承认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创造有效价值的贡献,强调在增加社会福利总量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这就要求客观分析市场主体的劳动贡献与资本剥削,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为手段,提高劳动群体的工资议价能力,在充分保证劳动者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坚决避免“内卷”或“躺平”现象。社会必需原则指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将按“社会必需”分配作为辅助分配原则,以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道德引导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在承认劳动能力是天赋特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必将产生一定程度甚至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因此,必须落实好分配原则、优化财富分配格局、规范分配秩序,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

(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要实现共同富裕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都是要么以对内严酷剥削和对外强势扩张来获取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要么以对农副产品价格

的“剪刀差”来支撑工业建设的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二者都无法回答彼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对此,毛泽东完成了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思维跃迁,为新的历史时期党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及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21],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明确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及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还要准确把握2035年、2050年这两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节点,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与现代化道路实践互嵌,因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一是发展与共享辩证统一。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创新进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构建首先实现了资本本位与人民本位的相互置换,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成为迈向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撑,而不是作为资本增殖剥削的对象。全体人民都是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并且拥有、支配、享受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发展成果。二是多维与主线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而就共同富裕作为理论中介而言,其主线逻辑显然贯穿于其他四个特色之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综合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要从生态文明角度理解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创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外部环境。三是共同与特色辩证统一。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既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富裕起来的“他山之石”,又要在共同富裕“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中总结、凝练、提升更具典型意义、更加成熟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

四、结语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凝结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成果,在毛泽东对“共同富裕向何处去”的探索实践中逐渐成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准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对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是对以往共同富裕理论的“术语革命”,对一般国家共同富裕道路的“范式转化”,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系构建”。因此,客观分析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内容,总结和吸收道路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有利于从返本开新的角度深刻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命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吕开武, 吴怀友.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22 - 28.
- [3] 张瑞敏.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解读[J]. 史学月刊, 2003(2): 68 - 72.
- [4] 马纯红.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渊源及其实践探索[J]. 毛泽东研究, 2016(4): 25 - 36.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罗国杰. 中国传统道德普及本[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4.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 1 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83.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33.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7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287.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 3 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426.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1921. 7—1921. 12):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82.
- [18] 左亚文. 论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辩证互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6): 73 - 77.
- [19] 贾可卿.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66.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2.
-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61.

(责任编辑:白丽娟)